

滕文生

江主席的‘ 常任 ’特别助理

滕文生毫无疑问的属于典型的中国高层智囊。他一直在党的核心理论部门工作，1964年他就进入有“理论喉舌”之称的《红旗》杂志社；1980年他被调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理论组的组长；1992年底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泽民总书记的政治秘书，以后进一步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长期在中央核心理论部门工作的经历使得他对党的理论的发展脉络了如指掌，对政治理论的前沿动态也了然于胸。因此他提出的建议总能一语中的、切中肯綮，能得到中央领导的首肯和采纳。许多我们所熟知的政策，比如说“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战略地位的高度”、“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三个代表”、“两思教育”、“以德治国”等等，都有滕文生参与制订。作为江总书记的助手，他参与了中央的许多决策过程，主持了许多调研项目，参与起草了许多文件和报告，为许多决策贡献了自己的心智。

滕文生还注重理论、政策的阐释和推广工作。在这方面，滕

文生著述颇丰，从 1980 年起，他共写作和主编了 9 本有名的著作，至于他所发表的文章则是难以计数了。这些著述为党的理论和政策的推广和普及活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江主席出国访问时，滕文生常常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特别助理”随行，所以他又被人戏称为“江主席的‘常任’特别助理”。江主席在国内外正式场合的精彩讲话，许多就出自滕文生这位大秀才的手笔。

在中国社科最高学府打下扎实的理论功底

滕文生于 1940 年出生于湖南常宁。湘南的生活相当艰苦，但滕文生却能做到在逆境中奋发，坚持不放弃学习，这为他以后命运的转机打下了基础。

“机遇只降临于有准备的头脑”，1960 年 9 月，20 岁的滕文生终于得到一个深造的机会，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

中国人民大学是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经济管理科学为主的全国著名综合性重点大学，与北大、清华比肩而立。如果说，清华是中国最高的工科学府，北大是中国最高的综合科学府的话，中国人民大学则是中国最高的社会科学学府。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是获准通过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最多的高校，也是中国社科研究论文和著作发表最多的高校。“九五”期间，人大共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 2008 部，发表论文 8031 篇。国务院

学位指导委员会下辖 15 个文科学科指导小组，均聘中国最著名的学科带头人担任组长，目前有 8 个组的组长是人大的教授。作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综合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50 年来共培养了 16 万名各类专门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担任正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有 3 万多人，副部级以上领导职务的有 300 多人。滕文生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在党的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具有传统的优势，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中有 60% 是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这些人才主要出自马列学院和滕文生就读的人大中共党史系。

在人大的 4 年中，滕文生刻苦攻读，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功底，为以后参与决策过程、提好政策建议奠定了基础。同时滕文生流畅的文笔、严谨的逻辑、飞扬的文采也是在人大的 4 年学习中培养起来的。

正因为如此，1964 年滕文生从人大毕业后一直不忘母校的恩情。他与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原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袁木和桂世镛、现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魏礼群、以及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等人一起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兼职教授。他常常回母校举办讲座、指导学生。

2000 年 10 月 15 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命名组建 50 周年纪念大会，滕文生出席了纪念大会并向母校致贺。

一直工作在党的核心理论部门

1964年9月，滕文生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毕业，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由于他工作积极，很快熟悉了业务，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红旗》是我国著名的理论杂志，是“两报一刊”中的那“一刊”

滕文生进入《红旗》后的第三年，“文革”爆发了，《红旗》被卷入风暴的中心，但滕文生并没有过深地卷入。1976年“文革”结束时，滕文生还是《红旗》杂志社的一名普通编辑。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地回春转暖，滕文生也开始在理论界活跃起来。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郑重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滕文生在深刻领会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之后，与贾春锋一起合著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一书，该书于1980年出版，详细论述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和意义。这本书使滕文生开始在理论界崭露头角。

1981年1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组建成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力群（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室成立之初，邓力群在全国寻找高级研究人才，滕文生由于理论功底扎实、文笔生动流畅、政治立场坚定、在“文革”中理智清醒而被选中，成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第一

批人员，并担任研究室理论组组长。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与中宣部、中组部等平级的单位，主要职责是：负责重大政策的调查研究，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中央书记处交办的其他事项等。它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前身，是党中央决策的一个重要的调研和咨询机关。滕文生在其中担任理论组组长的重要职务，实际上就是在党中央的决策中起了主要智囊的作用。

这期间，滕文生一直在对前沿的理论问题进行思考，1982年，滕文生和贾春锋合著出版了《向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学习：社会主义政治论集》一书。书中提出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的各种问题的看法。该书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1985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牵头组建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滕文生受邀出任常务理事。此后，滕文生一直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出谋划策、奔走呼喊。

1987年9月十三大召开前夕，中央研究机构进行改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被取消，其职能改由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负责。滕文生也改任由中顾委委员邓力群同志组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作组”的副组长。在担任此职务期间，滕文生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主要研究成果见于法律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的、由滕文生主编的《反和平演变教育问答录》等著作。

1988年初滕文生开始担任中共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在中顾委时，滕文生曾帮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同志整理回忆录的文稿，其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受到薄一波同志的赞扬。1989年之后，滕文生又开始参与高层决策的咨议工作。1990年，中共中央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10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滕文生就参与了《建议》的起草。1991年1月，滕文生还专门主编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建议〉学习问答》，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理解《建议》的精神。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召开，会上决定撤销中顾委。于是滕文生就不再担任中顾委秘书长一职了。

担任江总书记的政治秘书

考虑到滕文生的理论水平、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1992年底中央选定滕文生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泽民同志的政治秘书。从此滕文生就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智囊。

党的十四大通过党章修正案和江总书记的讲话稿。这两个文件滕文生都是主要的起草人之一。

十四大的党章修正案中在政治方面提出了三个新观点，即“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和“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三个观点正是滕文生一直著书立说所提倡的治国方略。对于前两个思想我们将在后文中详细阐述。

中国共产党在确立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问题上从未动摇过，但是十二大党章和十三大的党章修正案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都说得比较含糊，只是用“必须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这样的语言一笔带过。滕文生认为在新形势下有必要

在党章中明确这一问题，于是建议在党章的“总纲”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这一规定。

在江总书记的报告中不但体现了以上三个思想，还提出了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等党的建设的具体措施。1992年11月滕文生主编了《我国的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学习党的十四大报告论集》一书，深入细致地阐释了江总书记的报告的各方面思想。

1990年起，中美之间在人权领域的斗争一开始，滕文生就及时关注了这方面的动向，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人权思想。1992年12月，滕文生主编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百题解》一书出版。书中回答了有关人权问题的100个问题，阐述了我国人权政策的进步性，展示了我国人权状况的巨大发展，澄清了人们的种种疑惑。滕文生以他已发表的一篇文章《正确区分两种人权》为该书作代序。

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滕文生又参与了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政治部分的起草工作。1993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滕文生和魏礼群主编的《学习全国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文件辅导百题问答》一书。滕文生为该书作序：《抓住机遇，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学习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这篇文章中，滕文生阐述了他在《政府报告》中提出的两个观点：一个是“五个必须”，即“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必须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局面，必须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和发扬务实作风”。

第二个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滕文生在文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同政治体制改革

相结合进行，做到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和政府机构改革，是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紧迫任务，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一观点在八届、九届政府在任期间一直指导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工作。

滕文生一直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1995 年他向江总书记建议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题的“三讲”教育。有关这方面内容我们在后文中将深入论及。

滕文生不但关注国内问题，而且也关心中国对外关系问题。从 1997 年起，江泽民主席在出访时一般都会要滕文生陪同。滕文生对外的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特别助理”。从 1997 年到 1999 年，江主席的重要出访的重要讲话基本都出自滕文生之手。所以人们戏称滕文生为“江主席的‘常任’特别助理”。

当然，细心人也能发现一个身份的变化。1997 年 10 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上滕文生当选为中央委员。1998 年原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改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于是滕文生升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样就导致滕文生在出访时身份的变化：1998 年以前一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特别助理”，而 1998 年以后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

滕文生在起草党的十四大报告时，特别强调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他对于这一提法的思考，可以从 1992 年 10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四大报告辅导读本》中收录的他所著的文章《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中看到。

滕文生认为：“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必须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这表达了全党同志的愿望，体现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客观要求，确实是中国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滕文生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发展的原则来进行认识。滕文生总结道：共产党人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就是因为它是深深植根于实践的科学，是必须而且能够在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中发展和完善的科学。丰富多样的、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实践，要求这种“结合”，要求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不断突破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不适合现实情况的某些设想和论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和扭曲的认识。

接着，他又结合实际，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思想的意义：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就是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的伟大实践；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这一伟大的实践结晶，就是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以上论证的基础上，滕文生提出：14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完全可以说，只有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一步武装起来的共产党，才能把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振奋起我们整个民族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同心同德地克服各种困难，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怎样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呢？滕文生具体指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和要求。最基本的，就是要把这一理论贯注和渗透到党的全部生活和党的各项工作之中，进一步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的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牢牢把握改革和建设的主动权；就是要把这一理论作为加强和改善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加强和改善党的自身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就是要使全党同志的思想统一到这一理论上来，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提高政治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滕文生还重点指出，在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过程中，尤其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是新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党的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保证。

滕文生特别指出，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还必须巩固和发展

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他说：政治局面不稳定，社会动荡不安，民无宁日，国无宁日，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政策不可能顺利贯彻，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无法正常进行，人民生活也不可能改善。

第二，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掌握和运用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法宝。这是新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我们党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根本途径。

第三，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把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出来。这是新时期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根本任务。

在这一条中，滕文生重点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团结和带领群众进行改革和建设的战斗堡垒。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滕文生的政治思想的一篇纲领性总结。他在文中所指出的需要注意的各点都在此后党的文件和江总书记的讲话和指示中得到反复地强调。中央从 1992 年到 1995 年在党建方面抓的重点也是这几条。

独木支撑还是三足鼎立？

滕文生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就是党的建设，而他在党建方面着重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加强和改善党在三方面的领导作用。

之所以要提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有的人一度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实现党政分开，党的领导作用只体现在党的政治领导。滕文生根据江总书记的意见认为，党的领导不能只局限于政治领导，还要保证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在 1994 年 2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滕文生主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书中，他详细地论述了这一政治观点。

滕文生为这本书写作了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

文章一开头，滕文生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和根本保证。”对于这一论点，滕文生从两方面论述：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

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中国民主革命的责任，是近代中国的必然选择；而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显示了治理国家的智慧和能力。所以中国人民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他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体现在五个方面：

1.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能够制定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2. 中国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最有觉悟、最有理想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党，能够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骨干和核心。

3.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人民群众保持着最密切联系的党，它能够团结和调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广泛的力量。

4. 中国共产党是富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革命创造精神的党，能够牢牢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方向。

5. 中国共产党是积累了丰富斗争经验、政治上成熟的党，能够创造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良好环境。

所以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别的政党都无法担负这一重任。

接着，滕文生强调，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先就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滕文生首先引用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的一个论断：“党的基本路线要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搞得更快更好，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关键在于我们党，在于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

接着他提醒读者，我们一定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充分认识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定性作用，认清削弱、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危害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有关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措施，滕文生认为主要有五点：

1. 强化执政意识、巩固执政地位是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

滕文生告诫读者：“近几年来，我们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政治制度攻击最厉害的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取消中国共产党政治的法律地位。失去政治地位，对共产党意味着什么？历

史已经作了回答，苏联东欧一些国家搞多党制和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法律地位的惨痛教训，必须深深记取。”所以政权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一定要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执政意识不能松懈。

2. 要达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目的，就必须把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统一起来，全面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一个论点是滕文生论述的重点。他首先引述了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相关讲话：“（党的领导的）首要的问题是，必须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即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方向的领导。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又是统一的、不可分的。思想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组织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的重要保证。”

滕文生严肃指出：“前几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期间，削弱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根本不提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把党的领导局限于‘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和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这显然是十分片面和有害的。”

为了精确地分析三者的关系，滕文生严密地定义了党的三方面领导：

政治领导在党的领导中占有首要的地位，是实现党的领导的根本所在。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党的政治领导主要体现在用法律形式把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它们具有全社会必须遵守和执行的效力。

党的思想领导主要是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理论工作来实现的，加强和改善党的思想领导，就必须加强和改善这两方面的工作。

对于党的思想领导，滕文生特别提出：前几年，在“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口号下，党的思想领导被严重削弱。邓小平同志

深刻地指出：“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因此，我们一定要纠正前一段时间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把思想领导放到重要地位上来，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灌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各种工作，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

党的组织领导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中党组织的作用，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二是用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影响和带动广大群众。在加强党的组织领导方面，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

在逐个分析了党的领导的三个方面之后，滕文生提出党的三方面领导是密不可分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是党的领导的三个组成部分，它们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政治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核心，决定了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道路和方向；思想领导是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基础和灵魂；组织领导是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保证。”滕文生还特地引述了江总书记的话说：“离开了组织领导、思想领导、政治领导，那个领导核心就是空的！”

3. 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关键在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要做到这一点，滕文生认为必须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第二，必须密切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第三，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提高党的各级组织的战斗力。

4. 正确认识加强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对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这一条，滕文生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应当坚持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服务于和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而决不能打着“改善”党的领导的旗号，削弱党的领导。前几年，在这个方面有不少沉痛的教训。例如，在实行党政分开的过程中，就有不少措施导致了削弱党的领导；放松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在“改进”的名义下造成的。

5. 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滕文生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优点和特点，只能在实践中坚持和逐步完善，绝对不允许在我国搞西方的那种多党制。

这篇文章是滕文生多年理论思考的结晶。实际上，滕文生是通过这篇重头文章吹响了以后一系列党建方面的重要活动的号角。这篇文章发表后一年，即 1995 年，江总书记发出号召“一定要讲政治”，然后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题的“三讲”活动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逐年逐级推广，一直推广到县级干部。到新千年的第一年，中央又开展“三个代表”教育和“两思教育”。2001 年，江总书记又提出“以德治国”，并要求全党开展相关的教育活动。

表面上看，这些活动的提出没有系统的联系；实际上这一系列活动都是围绕着滕文生提出的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首要命题进行的：只有先搞好了党的自身建设，才能完善党在三方面对全国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正建立。